

目 录

语 录		1
开 头	一个研究领域	
	1 — 4节	1 ~ 18
第一章	大学理想	
	5 — 12节	19 ~ 65
第二章	大学起源	
	23 — 22节	66 ~ 118
第三章	大学世界	
	23 — 32节	119~172
第四章	大学管理	
	33 — 44节	173~237
第五章	大学功能	
	45 — 56节	238~301
第六章	大学学术	
	57 — 81节	302~448
第七章	大学评价	
	82 — 90节	449~514
第八章	大学改革	
	91 — 99节	515~577
结 尾	致 谢	
	100—101节	578~581
纪 念		封三内文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屈原：《天问》

无青无黄，无赤无黑，
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
巧欺淫诳，幽阳以别，
无限无隅，曷懵厥列！

柳宗元：《天对》

征得合作者同意

谨以本书献给我已经逝去的

母亲张忠春和妻子朱翠媛

以铭志我心中

永不磨灭的纪念

她们都是我的社会大学老师

是我精神生命的起点

作为一份菲薄的礼品

我还想将本书献给

我的母校

复旦大学

因为我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了四十年

开始了我观察、鉴赏、研究大学的历程

愿母校

与天同寿

万世常青

杜作润

开 头

一 个 研 究 领 域

1

万事开头难。

要写一篇文章，开头就有点难；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要写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开头就更难。据说，老托尔斯泰在写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时，为如何落笔第一句，竟想了好多好多天，最后却用了很平常的一句，“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这样的开头，最大的特点是不俗气，但却也不经典。可就是这样的开头，又被奉为典范，因为它立刻把读者引进了作者设计的世界。不过，作家可能还是觉得太平凡，在出版时竟又在前面加上了那句令人永远传诵和思忖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世事的

变幻，往往令人难测。

可是，笔者能奉献给诸君的只是一本学习之作，既无名家之作的高品味，更无时贤专著的大气概，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和水平，写个平平的开头。就算“前言”也好，“序言”也好，“楔子”也好，反正是个开场白吧！

看来，只能这样开头：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笔者想进入这个作为研究领域的大学。

研究，也得看是谁在做，以笔者的能耐来说，其实这个领域还是学习的领域。这里的“研究”是与“学习”（learn）相近的研究，而不是与“探索”（research）等同的研究。英文study说中了我们的情况。所以说，本书是“学习之作”，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愿诸君千万别以为这是客套和谦虚。笔者的确有些战战兢兢，有时甚至不知所措。这还得从写作此书的初始动因说起。

说来有点离道，笔者内心是想通过学习和写作获得一种解脱，追求一种快乐。

这是试图释去疑问或困惑后的解脱和快乐！

试想，今天的世界，大学有多热：那么多人想去上大学，其竞争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足球“世界杯”；还有那么多人都想与大学发生联系：商人、学者、外交家、政治家、避难者、观光者；文凭、地位、荣誉、金钱，似乎大学都能给，或者今天，或者尔后；有的人想操纵大学，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人批评大学、攻击大学，其动机却忽明忽暗。看到现在的大学热，又使人想起曾经出现过的大学

冷，冷若冰河。

试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把大学推得高而又高，甚至高不可攀，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又把它比得泛而又泛，以至于有“社会大学”、“社会大课堂”乃至“餐桌大学”、“家庭大学”之谓？为什么有的社会把上大学人数的多寡，作为评估社会平等的一种标尺，有的社会却又耽心上大学人数过多会成为不安定因素？有的时候有人说大学办不办无所谓，有的时候却有人说要争取几年内实现人人都上大学，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把大学与高等教育等量齐观，或者以它们作相互顶替，这合适吗？有的地方，私立大学内可以办公立学院，有的地方公立大学内可以办私立学院，但另一些地方私立大学却要国家下达招生指标，发国家的毕业文凭？这只是有趣呢，还是也有道理？

最使人感到需要释疑和解惑的还是大学这种机构本身。它看来好似坚不可摧的刚体，可以承受战火、灾荒的沉重打击，死而复生；它也可以经受政治动荡，甚至改朝换代的颠簸，乱而后治。慈善家光顾大学，独裁者也向大学顶礼膜拜，宗教及其改革者们对大学更是情有独钟。它看来又像是柔顺可人的婢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命于社会——主人对它的使唤。它亦刚亦柔，似乎还具有高级生命有机体的灵性。除了国家的政府，还没有一种社会机构能与之相比拟。

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实际上在做什么？它实际上又能做什么？大学还会变成什么？为什么会有大学的冷和热？为什么会有大学的兴和衰？为什么会有人去诊断“大学病”和“新大学病”？……

所有这些问题，常常使人魂牵梦萦，寝食难安，因为笔者学习在大学之中，生活在大学之中，工作在大学之中。

之所以想进入这个作为研究领域的大学，并且是离道而进因为笔者自己需要释疑和解惑，不为发现那些时髦而高贵的原则和原理，也不为用没有的发现去获取赞美和奖励，更不为以之去“点化”他人。这真的是在学习，稍高一点说是在鉴赏，再稍高一点说是比较，多少带一点理性的比较，为的是解除困惑，获取快乐。当然，很希望读者也来助我解惑，一同来享受解惑后的快乐。

在书堆中找快乐的人，很容易记住古罗马时代那位快乐派哲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在长诗《物性论》中，他曾写过：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站在堡垒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高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清新而宁静的），目睹下面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笔者很少有伫岸看海船的时间与雅兴，更没有临窗观血战的机会与豪情，所以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方面的快乐。虽然间或也有在真理的高峰俯瞰人世百态的种种感叹，但绝没有达到过可以称为快乐的那种境界。笔者寄希望于进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学，争取多少获得一些这方面的体验。其实，真要达到卢氏那种快乐的水平是很难的；人世间真正快乐的地方恐怕都是很难到达的。佛家说，极乐世界在西天，笔者肯定到不了西天，但又不愿进地狱，尽管那里的门可能是科学之门。作为只希图人世快乐的常人，硬着头皮走进的虽然只是这样一个作为研究领域的大学，但这也是很难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欢迎尊敬的读者朋友：请进来浏览一下吧。这儿虽然有艰难，但却是一个有趣的领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看看也高兴，知足常乐嘛！

2

好在我们远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国外，特别在西方，对大学进行研究的起始时期有待考证，但到 19 世纪，已有不少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并且出了不少著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也是一个使理性主义和思辨哲学可以一显身手的领域。人们常常提到的有德国人 J. G. 费希特的《大学的理念与构想》（1817 年）、休伯的《英国大学》（1843 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1852 年）、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1892 年），法国利阿尔的《大学和学部》（1891 年），俄国皮洛戈夫的《大学问题》（1895 年），美国人亚当斯的《威廉·玛丽学院》（1887 年），等等。

到了 20 世纪，这种研究的兴趣似乎有增无减；前期的著作包括了德国人保尔森的《德国大学》（1906 年）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观念》（1923 年），英国弗希尔的《大学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1919 年）和怀特海的《教育目的》（1919 年）以及拉什多尔的《中世纪大学》（1936 年），美国弗莱斯纳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1930 年）、莫里森的《哈佛三百年史》（1930 年）和赫钦斯的《大学的起源》（1923 年）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大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仍旧不断问

世。如 D. 里斯曼的《大学革命》（1968 年），永井道雄的《日本的大学》（1969 年）与《大学的可能性》（1969 年），麻生诚的《大学与人才培养》（1970 年），潮木守一的《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变迁》（1973 年），伊藤恒夫的《大学的现实与理念》（1973~1974 年），阿什比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1971 年）与《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1974 年），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用处》（1963 年），以及博耶的《美国大学教育》（1987 年）等，但出现了新的态势。

第一，由于世界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教育的规模、它的实践性和社会性都被大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应用学科的概念已逐步形成共识，许多关于大学的研究已“掺和”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之中。这并没有表示研究者们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学的兴趣有所减弱，翻开任何一本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几乎绝大部分仍然讲的是大学，这就是明证。笔者有时甚至想为高等教育鸣不平：有些冠以“高等教育”名称的著作，何以不喜欢把他们的研究推向高等教育，却要专心钟情于大学？诚然，时至今日，正规的、传统类型的大学，仍旧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研究中的“掺和”现象，既说明大学在今天制度化的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说明人们对大学的研究兴趣，至少不减当年。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研究领域，大学具有好像是万能的价值和作用，不管真的是不是这样，人们相信它。

第二，由于研究人员的逐渐增多，出现了许多研究机构和组织。这些机构和组织大都是以高等教育方面的协会、研究中心等面目出现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其下属

的（巴黎）高等教育局和（布加勒斯特）欧洲高等教育中心、设在委内瑞拉的加勒比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新加坡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和开发研究所也受它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上百个地区性的组织，如在纽约的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在荷兰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协会；还有各个国家的组织，据说这可能有上千个，如美国的高等教育协会、美国教育理事会，英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协会等。也有一些研究机构和组织还保持着直接面向大学的称谓，如设在巴黎的国际大学联合会，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大学校长常设委员会，以及拉丁美洲大学联合会和非洲大学协会等，它们都是研究的协调性机构，有如美国的大学协会等。但像日本广岛大学的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其它一些国家的类似机构，则是进行具体研究操作的机构。

第三，各大学院由于开始重视对自身的现状分析、检查和评估，重视自身对大学外部环境的适应情况的调查，开始了所谓“院校研究”并且建立了许多具有实质性研究使命的机构。此举最先出现于美国。现在，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之中，特别是规模较大者，一般都设有院校研究机构。欧洲人的院校研究也可以追溯得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说，纽曼、费希特等人的著作也可以认为是院校研究的产物，但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宏观或者更富理性，而后起的美国院校研究则更务实一些。目前，欧洲人的院校研究实际上已加盟在北美的院校研究圈中，其中主要是在美国的国际性院校研究协会，至少受它的影响较大。不过，1989年也正式成立了“欧洲院校研究协会”。

第四，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情报资料与学术期刊不断出版，这进一步扩展了研究成果，凝聚了研究队伍，也深化了研

究内容。这一态势，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学乃至高等教育学科已确立了自身的不容争议的地位。这些期刊包括国际大学联合会（巴黎）的《通报》、英联邦大学协会的《最新情况通报》、UNESCO 欧洲高等教育中心的《欧洲高等教育》、欧洲高等教育和发展协会的《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和规划》、许多法语国家大学协会的《大学》等；还包括许多国家有影响的杂志，如加拿大的《大学事务》，美国的《变革》、《学院和大学》、《高等教育纪事报》，德国的《大学教育》、《高等院校通报》，英国的《太晤士报高教副刊》、《大学史》、《高教研究文摘》、《剑桥教育杂志》，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学论集》，印度的《高等教育杂志》和墨西哥的《大学》杂志等。据称，具有国际影响的期刊，不下六十种。

由此可见，我们也只是赶浪潮的人，虽然赶好浪潮也很难。

3

在我国，研究大学的历史与大学本身一样，有同样可引我们骄傲而自豪的古远。只不过，在本书中，笔者将近代大学产生前，被称为大学的那些机构，认定为古典大学（或学院），有时也认其为前大学，但在写作时，除非需要，也常常随俗呼之。

根据熊明安先生的考证，我国古籍《大戴礼·保傅》、《礼

记》中的《文王世子》等篇章，都有有关周代初期大学的记载或论述。此外，《礼记》中的《大学》、《学记》及《管子·弟子职》、《论语》、《孟子》等也都录有关于大学的言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更被许多人推崇为是对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的精辟语录。

又据《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兴太学……”，我们知道了汉武帝时设置太学的事实。太学建校中的办学思想，在当时名儒董仲舒的《对策三》中也有所论证。在《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关于唐代国子学的课程、学制以及科举、授官的记述。其它讲当时大学的古籍文章，包括：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通书》，教育家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近思录》、《静江学府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等；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观德亭记》；清代陆世仪的《思辨录》等。

这些篇章，从时间上，跨越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达两千多年之久，在这样发展非常缓慢的超稳定的社会情境中，作者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有的论说，仅仅是片言只语，既过分原则，也太空泛；有的章句虽然文字优美，也有耐人寻味的意蕴，但总体上，也只具有像古董一样的鉴赏价值，与现实中的近代、现代大学很少能发生关联。

历史跨越至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列强之坚船利炮，既动摇了封建统治绝对权威的政治基础，也动摇了它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基础。随着新式学堂的逐步建立，西方教育思想的不断引入，对大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息。

这时的大学研究，随着建西方近代模式大学的创议而展开，表明这一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气象。但文论著述仍取一事一议的样式，未成系统。如 1901 年张百熙的《变通翰林院规则》和 1902 年写的《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等。严复则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其中包括大学教育，时称“高等学堂”的教育思想。以后，蔡元培则通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 年）、《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1919 年）、《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1922 年）、《对于学生的希望》（1920 年，毛泽东担任记录的讲演稿）等，宣传自己对中国办大学的主张和方针；杨贤江也通过自己的文章和书稿《教育史 ABC》（1929 年）、《自然界里的生活》（1921 年）、《对于平民大学的感想》（1922 年）、《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1928 年）、《中国教育现状批判》（1929 年）等文论，阐述自己对大学和大学生的见解。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随着大学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规模上的巨大扩展，教育体制的渐成规范，以及大学功能的日益完备，大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一步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参与研究的人员增多，相关的学术组织和机构林立，相关的刊物数以百计，每年发表的文章包括译文、论文估计约 1.5 万篇。这被认为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及至发达国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对于研究成果来说，其质量和水平我们很难作有把握的评价。虽然笔者有很不满足的时候，但觉得这是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反映，我们很难超越其它各个方面的效益和效率，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研究的。

但是，仍然可以对研究成果的外部特征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描述，对其内容的指向性进行一些区划，当然也是试探性的。

首先，是“掺和”甚至“顶替”的现象，可能更胜于西方。例如在一本名为《高等教育》的全国核心期刊（我们是任取的一本）中，它有一个“教学研究”的栏目，不仅所有四篇文章的内容，都是讲的大学和大学本科生的教育和教学，而且标题题目也几乎完全是“大学”的：《论走向新世纪的文科教育改革》、《论情感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思考》、《影响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因素和解决方法》等。当然，大学中也有高等教育，而且前已述，它还是高等教育的主体，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讨论。

这种掺和或顶替的现象在许多编、著的大部头作品中也很普遍，包括好几部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及其它分类或专题性著作。

可以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本书无意于拒斥或批评它们；相反，笔者甚至还是很高兴，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人们仍然普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只不过采取了钻“冷门”的直截了当的态度而已。

其次，是个案研究的热情很高，这方面的著作特别多。

其中以湖南教育出版社80年代中期推出的《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的规模最大，原计划出《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等60所大学，每校一本，现已出了50多本。

还有就是全国各大学都各自编写自己的校史或校史资料，仅笔者收藏的就有：1992年出版的《南京大学史》、1995年出齐的两卷集的《复旦大学志》、1995年出版的两卷集的《北洋

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990年版的《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等；此外，还有中山大学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29）》、四川大学编的《四川大学史稿》、武汉大学编（内部交流）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汇集并正式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大学校史资料》等。

另一类个案是汇集成册的大学个案序列。其中笔者所知的有：1988年由卫道治主编的《智慧的摇篮——世界著名大学述略》，该书收集编写了美、英、德、法、日、苏等六个国家的25所著名大学的材料，每所大学一篇文章，写作者研究评述的份量较大；1990年由黄展鹏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概览》，共收录中国大陆的著名大学共162所，资料介绍较全面；以及由杜作润主编并于1994年出版的《世界著名大学概览》，共录入世界五大洲38个国家的104所著名大学，该书除《前言：大学之道》之外，每所大学有一篇资料性的文章，但在校长办学思想和办学特色方面更受重视，全部资料都是90年代前后的最新资料和数据。

所有这些个案研究，都是笔者研究和写作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第三，是分类、分专题研究比较普遍。编、译、著的著作及论文都有这种特点。其中，为笔者等经常参阅的著作有：朱九思等主编的《高等学校管理》（1983年）、宓洽群的《大学教学原理》（1989年）、杨德广的《大学德育论》（1990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1995年）、王亚朴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1983年）、匡兴华主编的《高等

学校的科学研究》(1991年)、熊明安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年)、付克著《中国外语教育史》(1986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的《中国电子工业高等教育简史》(1995年)、郭玉贵的《美国和苏联学位制度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学位制度》(1991年)、符娟明等编著的《比较高等教育教程》(1990年)、杜作润的《高等教育的民办和私立——比较研究》(1993年)、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1994年)、蔡克勇编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年)、吴毓骥等翻译的《剑桥奇迹——高技术在大城市的成长》(1987年)、[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987年曾钜生译)、[加]许美德和[法]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等1990年合译,该书的英文原名为:《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供参考。)、[英]阿什比著《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滕大生1983年译)、[美]博耶著《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88年译)、[美]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1987年编译)等等,可能至少有上百种。其中,有许多著作,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都有很高的指导或参考价值。

第四,虽然指明讲大学的著作不多,但以《高等教育学》为书名的著作也已不少。前者,我们知道有孟宪承的《大学教育》(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第一版);后者则除潘懋元的前后两部(1984年的两卷本、1995年的单卷本)之外,还有郑启明和薛天祥的一卷部(1985年)。此外,还有杨德广的一卷部,书名为《高等教育学概论》(1991年出版)。虽然笔者一

直将这些著作当作必读书，并从中受到启发。它们既是笔者向学生讲授“高等教育学”这门课的主要教材，也是笔者自己进入高等教育这一学习领域的教材。但是，我们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这些著作虽然的确掺和着讲大学，如前面所述及的，但有时为要照顾高等教育的各种层次、模式、方方面面，不得不将实体机构的大学拔“高”，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学的实在性、具体性。笔者的困惑依旧：

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实际上能做什么？大学还会变成什么？为什么会有大学的冷和热？……

4

长时间的思考，一时间的“顿悟”，这被学习心理学认为是一种学习的模式。

面对着这综合性的、历史的、比较性研究的作者不多的情境，面对着这指名道姓讲大学，跨类别、跨时限、跨地域研究成果近乎空白的情境，我们的确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此外，还有那么多的困惑，那是实实在在的烦躁、苦恼与难受。

“顿悟”，是在偶然读到一篇鼓动研究“北大学”即“北京大学学”的论文之时产生的。这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它的开篇第一段就写得字句铿锵，豪气干云：“中华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迨及中国近现代，世纪百年，岁月沧桑，西学东渐，中西融合，新旧激荡。中华学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原文如此——笔者注），推动近现代学术在争鸣中发展，在转